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历史演变

王世根 余福美 周 青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从 1953 年开始的,至今已有 40 余年。其历程艰难而又曲折,但换来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本文试图对经济建设模式的演变作一历史探讨,这对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有意义的。

一、工业化起步与借鉴苏联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时间的经济恢复,工农业总产值均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我国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然而,我国的经济、文化仍沿十分落后。1952 年,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 26.6%。钢产量仅 135 万吨,与同期的国家比较,苏联达 2349 万吨、英国 1580 万吨、美国 7077 万吨。人均计算苏联是 134.1 公斤,印度是 4 公斤,中国却只 2.37 公斤,差距很大。许多工业部门还是空白,既不能够造汽车、飞机、拖拉机,也没有自己制造的精密机床设备。五亿人口,文盲、半文盲占 90%。中国的工业化就在这样的起跑线上开始的。

实现国家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苏联通过工业化,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事实对我国有强大的吸引力,苏联无疑是我们的榜样。学习苏联就成了当时重要的内容。

苏联工业化形成一套自己的模式,它是用一种高度集中的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依靠国家行政手段来管理的经济体制。其特征: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调节,二是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机制,三是注重所有制变革,四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套模式对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一个重要的借鉴。我国当时提出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一是集中抓工业化计划,二是搞所有制的改造,其基本的框架就是学习苏联的模式。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共中央决定从 1953 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改造和建设并举的方针。“一五”计划进展顺利,至 1957 年,各项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195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 783.9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 21%,平均每年增长 18%。其增长速度名列世界前茅。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5%。财政除 1956 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财政收入结构也发生变化,1950 年,国营企事业单位收入只占 13.4%,其中工业收入仅占 6.8%,1957 年国营企事业单位收入则上升为 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上升为 19.1%。到 1956 年底,三大改造亦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所有制改造的胜利,我国就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形成的原因:(一)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这是主要的。1953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成了全党干部学习的重要教材。“一五”计划本身又是在苏联帮助下制定的。为了使中国经济管理干部学习管理方法,由当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14位副主席给中国赴苏谈判团讲课。根据讲课内容整理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一书,就成了我国进行计划管理的重要依据。因而,我国当时在建立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以及劳动工资等管理体制时,都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二)受旧中国集权管理和革命战争时期供给制的影响,使我国更多地习惯于用集中的、行政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三)我国经济规模比较小,经济结构简单,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当时并未显示严重的缺陷。(四)在国际敌对势力封锁、国内因战乱造成的生产力大破坏的情况下,要迅速恢复生产,采取由国家集中资源,集中资金和人力,兴办关系全局的重大建设事业确见成效。(五)为了解决私人经济成分生产的盲目性,而造成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可以按照社会需要去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从而避免了盲目生产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六)为了使刚刚获得解放的全体人民都有工作做,有饭吃。从历史条件和经济规律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处在被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或者处在军事对峙的环境中,要求自身得以发展,并有效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战争的需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合理的;在小农经济比重大,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科学文化落后的社会形态下,实行计划经济不仅有其社会基础,而且容易取得成效。事实上,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作为一种重要的调节手段,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调节手段集中办一些重大工程项目,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例如,苏联在30年代,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包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集中力量进行国防建设。结果,仅10年,苏联就由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推进工业的迅速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它凝固化、教条化、绝对化,就必然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集中的计划经济有着很大的弊病。主要有,第一,中央制定计划,由各级行政机构层层下达执行,由于部门发展,分工愈细,种类繁多,情况千差万别,市场信息千变万化,使计划的科学适用性受到很大冲击,不是执行走样,便是难以满足全社会的多种需要。第二,企业执行指令性计划,原材料靠调拨,商品靠包销,资金靠拨给,利润额上交,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既影响企业,也影响职工的积极性。第三,过分强调公有制,计划向全民所有制倾斜,使小集体转为大集体,再转成国有,生产关系的改变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脱节。第四,分配上平均主义。名义上“按劳分配”,实际上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一个样,严重影响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第五,计划经济的产品价格和价值背离,工农业产品比价及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其价值不能通过市场实现。第六,各地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有销路的商品不能扩大生产,而生产条件较差的某些产品则因有利可图而盲目生产。经济运行呆板,死气沉沉。毛泽东对此已有所察觉,看到苏联经济模式存在不少弊端,感到需要重新研究和探索。

二、自己探索建设模式开始与曲折

1956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随着“一五”建设计划的实施,逐渐感到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中国自己的建设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

中国探索自己建设的模式开始于 1956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召开中央 34 个部门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调查研究后写出《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著作以及毛泽东、陈云对有关问题的讲话是探索的集中体现,提出许多闪光的新思想:第一,阶级矛盾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第二,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为此 1952 年基本建设投资重工业占 34.3%,轻工业 9.1%,农业 14.8%,至 1955 年重工业占 47.3%,轻工业 5.2%,农业 6.7%。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优先是必要的,但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①不能像苏联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要实行农业与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三是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国家和工厂、合作社及生产者个人,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规定合理的比例,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能象“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搞得很苦”。^②四是在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的同时,必须扩大地方自主权,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③五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④在社会主义占绝对条件,可不可以再有少量的私人企业呢?毛泽东针对当时暗地办地下工厂时说,“要把地下工厂使它成为地上。”提出以公营经济、计划生产和国家贸易为主体,以个体经济、自由生产和市场为补充,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六是,提出了“向外国学习”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⑤等等。这是中国自己探索建设道路的新思想。它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是有成效的,使 1957 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未能坚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相反,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加上当时国内某些矛盾的激化现象,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对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估计过于严重,当作阶级斗争对待,犯了反右扩大化,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滋长起来,使探索中国建设道路和模式出现了曲折。这不但打乱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而且给共产主义形象带来极大的混乱。

经过严重的挫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发现存在的问题,想方设法加以纠正,特别在经济建设上,制止了“共产风”,强调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各级干部比较认真执行,到 1963 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1964 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在政治上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错误,而且继续发展“左”倾错误,从 1959 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后,在反修防修的旗帜下,不断强化阶级斗争,逐步升级,终于酿成了十年内乱的可悲结局。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刚刚提出,就遭到了夭折,经济建设刚刚理顺又遭到严重地破坏。据统计十年内乱经济损失约 5000 亿。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严重的曲折。

从近 20 年探索建设道路实践,可以勾划出毛泽东设想的建设模式。他看到苏联模式的不足,渴望根据中国情况创造新的模式。归纳其主要点:一是经济建设要高速度,实行全国的计划

经济。二是建设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为纲,以抓革命促生产;三是工作方法是运动群众,依靠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指挥;四是管理体制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体,由党代政高度的绝对统一。五是消灭私人经济,实行经济平等,杜绝资本主义,限制商品经济。六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文革”是毛泽东晚年为实现他构思多年的理想社会而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实践,但这种具有相当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使人民遭到了巨大的不幸。

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探索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思想,虽不成熟,却注重与中国情况结合。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脱离了中国国情,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泥坑,犯了许多错误。然而,正反的历史经验,却为以后中国创造新模式提供了条件。

三、开辟经济建设的新道路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从而为开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经过近20年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是现代经济建设必由的强国之路。中央决定对内实行政策,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以此打破僵化封闭的体制,把国内经济搞活。通过改革来搞活经济,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中国改革是采取稳妥地分步骤地进行: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从点到面稳妥展开。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在南方设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试点窗口,利用国际市场、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试点日见成效。1984年中央决定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把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城市全部海岸线对外开放。1985年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海南省作为经济特区。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央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二,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⑥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与美国、加拿大客人谈话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的经验得出的新理论。他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⑦1980年他又指出:我们的经济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⑧当时酝酿的改革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迈出了摆脱传统观念重要的一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⑨然而,当时市场还只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处于次要的、

从属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需要利用市场机制把经济进一步搞活。但是人们的旧观念不时困扰，即使承认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仍担忧市场经济搞多了会导致资本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并制定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在理论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会议还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决定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从计划与市场关系来说，从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以后邓小平同志又以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勇气，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总结了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⑩这就在根本问题上解决了长期来害怕姓“资”姓“社”的困扰。采用计划还是市场调节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这在理论上是一大解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者都要，两种手段都可以用。发展商品经济，把企业推向市场，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并不是说不要计划。国家实行指导性计划或者说宏观控制一定要发挥管理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要计划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只是市场在先，计划在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⑪

从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及当代世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0多年来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反复证明这样的真理：第一，建设模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凝固不变的统一模式。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一定要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第二，选择何种模式，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情况结合起来，联系世界时代的发展，制订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和政策。第三，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一种建设模式的提出和思考，都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逐步成熟而上升为理论的高度。第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本身就带有失误和追求，一定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僵化，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第五，马克思主义是永远发展的，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入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健全民主，完善体制，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得到发扬光大。

①②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274、275页。

④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34页。

⑤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⑥⑦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6～17页、63页、95页。

⑧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⑨ 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⑩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⑪ 见《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